

第一章 军队与叶利钦 总统的保卫者

1996 年冬

我感到饥饿和十分恼火。今天又早早地在家人尚未睡醒之前就去上班。为的是不与妻子、孩子和爱犬舍利照面。已经多少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可我那一份（其中有吃腻了的罐头焖牛肉）军官口粮不够一星期吃了。家里的冰箱里——空空如也。从某个时候起我开始觉察到，每天晚上家人都用我那只永远饥饿的狗那样的目光来迎接我归来。

我想象，当我把自己的区区 150 万卢布 带回家的时候，大家会多高兴，虽然到那时所有这些钱都将是别人的，因为要还债。

在地铁里，我看见一个干瘪的老太婆。她手持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看在上帝面上，请施舍一点吧——我要吃饭”。我也想在军大衣外面的胸前挂上这样一块小牌子。不过，我只想加上一个署名——“祖国的保卫者”……

指旧卢布，相当于 1500 新卢布。——译注

*

*

*

国家拖欠军队薪饷已经快 3 个月了。偏偏在这时候，好像有意使人为难一样，老婆又害了不大不小的病，于是，我成为家里惟一的供养人。日内，不得不在零下 20 度的严寒中在基辅市场泡上半天，以便出卖一套冬季军服。我求上帝不要让任何熟人、总参谋部的人或他们的妻子认出我来，近几个月来他们常常怀着同样的目的闯到这里来。然而，我害怕的事恰恰就发生了：一位老熟人——总参军事学院的教员、退休将军认出了我。他看见我因含羞而冒虚汗后，打开了一只里面装满了卫生器材的，像坦克炮口套那么大的手提包说道：

“没有什么可耻的。生活所迫嘛……”

他的情绪十分好。两只水龙头卖了个好价钱，那是他当军官的女婿还在德国服役期间就贮存起来的。他提议“暖暖身子”。我们喝了两口，聊起了天。他说，中国军官来到总参军事学院留学了，还有母校一座不大的、顶棚很高的大厅正在改建为一座礼拜堂——这件事院长罗季奥诺夫上将引以为自豪。吸收了志愿的画家参加改建，说服了一个什么基金会的主席、一位退休上校慷慨解囊。“而在其他方面，到处都一样，人们都在叽咕：‘究竟什么时候发钱？’……”这位总参军事学院的将军回忆道，2月23日，祖国保卫者日，罗季奥诺夫将军没有做应景式的报告，他向学员和教员们说：“节日不会过得愉快。不过，我们相信，我们会挨到好光景的。”然后放大家回家……就在当天，一则恶毒的流言流传到了总参谋长的接待室，说罗季奥诺夫“破坏了庆典”。那时，总参谋部有人怀着特别的警惕性紧盯着伊戈尔·尼古拉耶维奇。原因各不相同：一些人是“盯着”总参军事学院院长这个职位（罗季奥诺夫已经快到 60 岁了），另一些人则是别有用心地促使国防部长注意他与列别德的友好关系，并且搜集他讲的带刺

的话，以证明他对克里姆林宫的不忠。

卖卫生器材的将军问了问我那些他教过的总参军事学院毕业生的情况，特别是总参作战部长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巴伦金上将的情况，他在巴伦金准备博士论文答辩时曾辅导过他。

我告诉将军，巧的是 2 月 23 日巴伦金在庆祝大会上跟罗季奥诺夫一样也说了“节日过得令人不快”这样的话。在节日前夕，他向国防部长要求说：“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面对人们，我两手空空，心里很不好意思。请您给十几块刻有您名字的手表吧。”格拉乔夫同意了，给的甚至多于他要的数。

那天，总参作战部的许多军官特别感谢国防部长和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些“指挥员牌”手表在老阿尔巴特大街上是抢手货。祖国保卫者们可以有点酒喝了；可以有点下酒的小菜了……我想象，一位美国旅游者从莫斯科回到那个叫什么科罗拉多州的地方时将自豪地给亲朋好友们看那些刻有“俄罗斯国防部长赠”字样的“指挥员牌”手表……

将军走了。我仍留在市场上做自己的买卖。为了快点悄悄离开耻辱之地，我决定以 25 万卢布把自己的货卖给一个塔吉克冷藏车司机，他是来莫斯科卖卷心菜的。但是，这个不起眼的司机原来却是一个精明的买家。他穿上污迹斑斑的棉大衣后，用本族的语言把助手们叫到跟前，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大声地议论我的货。在那个时刻，我真想戴上特警的黑面罩……

近来我干了好多一样又一样的私活来挣钱：下班后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的一家银行收拾家具，在货车站卸火车上的木材，乃至在“大都会”饭店大门口在大腹便便的外国人中为美国减肥药“赫巴莱夫”做广告。直到联邦安全局的少校对我说：“悄悄走远点，免得我看见你。”我在业余收入的是需要付出许多精力和时间的血汗钱，但却少得可怜。

上校们在光景很不好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总是会冒出很不好

的想法的.....

一种生活方式

.....是谁又在敲我办公室的门了。一位同事走了进来。问了好，接着他把渴求的目光射向桌上一包“LM,牌(我们把它叫做“列昂尼德·马卡罗维奇”)香烟。

“对不起,可以要一支吗?”

话还没说完,手指已经在烟盒里扒拉烟了。这很正常。我也时常这样。要是在10年前,我宁愿在大街上光着身子奔跑,也不愿向同事讨要一支烟。现在,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赤贫的生活也把神圣的军官礼节变成虚伪的了。我们自己正在不知不觉堕落下去。

上校熄灭了烟头。然后看着我——这样的目光我每天在人行通道上和地铁里都遇到。

“老伙计,发薪前你身上分文没有吗?”

我简直无力相助,因为我本身带着同样的目的一上班就跑遍了各个办公室。挽救自己财务状况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不过,我没有失去希望。沿着地下狭窄的、两侧贴着雪白瓷砖的、迷宫似的走廊慢慢走进邻近的一座楼,去找小瓦里亚,他在总参军事战略研究中心工作。他的办公桌上铺着一张标有密密麻麻数字和一支支不同颜色箭头的保密大地图,图上有一页撕下的日历,上面写着:“欠伊万诺夫——100,欠彼得罗夫——500,欠西多罗夫——750”

“你也成了穷光蛋啦?”这位战略家还没有等我开口就说道,他为自己穷困而操的心甚于为敌人阴险企图而操的心.....

通 道

沿着原来那条装有雪白瓷砖的地下通道往回走，迎面走来国防部副部长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大将。从容稳健的步伐，护理得好好的鬓发，微红的面庞，没有丝毫半饥半饱的迹象，一双奸诈阴险的眼睛。真想狠狠地对他说：“交出 100 万来！”

在总参办公室和走廊里每逢遇见此人，我就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将军，人们一遇见他们，脑海里就闪现出种种要骂他们的话。关于科别茨，一连串的传闻已经流行多少年了：在曾经参与一家商业公司的带犯罪味道的活动的一些人中，人们就提到他的大名，而在该公司拍板的是大名鼎鼎的季马·雅库鲍夫斯基。后来，有人告发科别茨参与了把国防部在北切尔塔诺沃街上的一幢 25 层大楼出售给一家商业公司的那笔肮脏交易。最近，我们许多人又在窃窃地谈论似乎将军接受了商人们的某笔贿赂。关于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一幢神话般的别墅也有非常惊人的传说……大家都说，科别茨在克里姆林宫圈子里有靠山，因此，现在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我们迎面相向而行。我没有戴帽子，因此，按条令我必须双手紧贴裤缝，行注目礼。敬礼嘛我可不愿。于是我溜进旁边最近的出口……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开始在抽屉里乱翻一气，指望在一堆文件中找到一包匈牙利鱼汤料——困难时用的紧急储备品。不料总参谋部里饥饿的老鼠早已把我这一份汤料吃掉了一半。一只玻璃杯，水，煮水器。我已经像猫一样馋涎欲滴，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散发出香味的稀汤。从不久前起，每逢午餐时间，总参谋部的许多办公室就散发出做饭的香味。起初，我对此感到

恼火。现在，我的办公室也散发出鱼汤味了。这样，我也就不反感了。

小插曲

……总参作战部“核武器”处的一位上校一面用汤匙在一个中国造的大口热水瓶里咣当咣当响地搅汤，一面若有所思地看看显示北约核潜力的图表。他对我说实话，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去食堂的时间了。

……我看到过总参谋部的一位上校在哭泣：他的妻子卖掉了家里的宠物——一只浅灰色的德国犬，为的是买一张去哈巴罗夫斯克的飞机票，因为急着要去参加父亲的葬礼。我的来自彼得堡的一位朋友是个古书迷，如今偷偷地不让家人知道逢假日去涅瓦大街书摊上卖书挣点钱。他向我叙说了——一个上校在图书馆把一本《俄罗斯作家考》的书藏在腹部衬衫里面被人家当场抓住的事。这本书是稀有本，瑟京印刷厂印刷，1903 年出版……

在我出差去远东期间，我曾看到太平洋上美国白人和黑人水兵在本国军舰上对着我们的海军水兵亮出屁股，并同军官们一起放肆地哈哈大笑。而在过去，他们是常常向我们的海军军旗敬礼的。

在下塔吉尔附近的导弹发射井里，我看见一位患营养不良症的少校努力用一把铝勺子咣当咣当地在刮罐头盒里剩下的焖肉。他说，他的孩子和老婆见到这种罐头焖肉就想呕吐。

在堪察加，在军人商店，海军官兵发薪前在帐簿上“签字画押”赊购食品。终于有一天钱领到手了，但欠下的债却超过所领的薪金的两倍。

在阿尔巴特大街上，一位伟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长时间不顾

丢人现眼地跟一个嘴里嚼着口香糖吧哒吧哒响的奖品收购者讨价还价。那个人对一枚红旗勋章开价 3 万。老战士要价 10 万。他对这个投机商嚷嚷道：

“你心狠得恨不得用 7 包酸奶钱买下用鲜血换来的勋章哩！”

有一段时间，在“革命广场”地铁站，在海陆空三军将士铜像旁，每天有一位在阿富汗打过仗的残废军人伸着一只手站在那里。后来，他不见了。有一次，我忽然出现一个思想，感到车站的雕像造型中现在似乎已缺了一些什么……

……克雷拉托夫上校的妻子去世时，我们大家尽力凑了点钱。国防部给予了资助，发了补贴和治丧期间的工资。亲戚也送了一点钱。这些全部加起来才勉勉强强够丧葬和葬后宴请的费用。要把墓地稍稍围起来，钱就不够了——1 米围墙要 200 美元……克雷拉托夫上校为祖国服役 33 年了，获得过两枚勋章，在阿富汗战争中负过伤。也是在那里得到了肝炎的“犒赏”。在调来莫斯科之前曾先后在 14 个部队单位“瞎忙乎”。他有两个孩子，都成年了。他与孩子住在军官宿舍一间小房间里，只付电费和煤气费——为此他的孩子每天早晨靠扫院子增加点收入。

我们也会有三长两短的时候。

沙皇时代一个退休上校按规定有丰厚的退休金、一匹马、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一块不小的份地。苏联时代退休上校的退休金相当于高级工程师的薪水。眼下退休上校的月退休金是 130 万卢布^①。亡故时再发给 20 个月的基薪（我们把它叫做“埋葬费”）。按法律规定他可得到一块地，可国家往往什么也不给。不但如此，他简直活到胡子全白了也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房子，什么是正常的工作日。因为整个服役期间过的就是心力交瘁的非常人过的生活。今天，军官的寿命已经几乎与矿工相同了。对此我们总

^①指旧卢布，相当于 1300 新卢布。——译注

参谋部流行着一句苦涩的开玩笑的话：军官在世上有 8 年可过上人过的日子，即上学前的 7 年和退休后的 1 年……

我服了 30 年役，深信只有特殊类型的人才为自己选择这个自愿充当奴隶的、名为“对祖国的神圣天职”的职业。而他们的子孙选择父辈的命运，也沿着他们的足迹走下去。

这里面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就是一种非常俄罗斯的东西？也许，是因为许多军官从产院接出自己心爱的孩子时包裹他们的襁褓是尚未用过的军用毛绒裹脚布，他们的第一个玩具是带有火药味的子弹壳，而父亲的军官帽则是他们爱戴的帽子？

俄罗斯的军人世家是军队的骨干。有些人家为祖国服役几乎有 300 年了。这样的军人世家现在部队里还有很多。我们总参谋部里也有。但是，近年来许多子弟越来越多地自愿离开军队。时而听这个上校或将军说：“儿子离开军事学院了”，“孩子不上军校了”，“儿子不当兵了”……

儿辈在离开，父辈也越来越多地离开。有的下到商海，有的退休，有的去到另一个世界……

霍里科夫中校情愿一死而不愿像牛马那样苟且偷生，他向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他的儿子、列宁格勒高等军事指挥学校的学员，在父亲的灵柩旁嚎啕大哭，说了骇人听闻的话：

“我不想当军官了。我要跟他一样……”

我的朋友阿尔扎马斯采夫上校的儿子快要中学毕业了，一次，上校对我说：

“我不想让我的儿子当军官。”

可是，他的孩子还是当了军官……

军队就像一颗树一样，如果不长出新枝幼芽，就会枯萎。

谋 逆

……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又钻进了脑袋：我们全都在过某种麻木不仁的日子。思想上不能接受国家和军队中形成的状况。可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诅咒这个秩序，在阿尔巴特烟雾弥漫的阴暗斗室里表示愤慨，继续像钟表的指针一样温顺地、不容抗争地、一圈又一圈地转。莫非我们就仅仅是为了每月一次把自己的 150 万卢布 拿回家的需要吗？要知道，服役和人类生存毕竟还有崇高的目的……生存和生活——不是一回事。

无疑，当心口痛时，当女儿不愿意穿着补过的长袜去上学时，当妻子将订婚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要去寄售时，就很少会去考虑那些关于军官天职，关于“俄罗斯特殊道路”的高谈阔论了。关心家庭的土豆袋子要比关心国家向什么方向发展重要得多。

在总参谋部闲暇聊天时，我的一位朋友和精神导师退休上校彼得罗洛维奇说：

“我们全都很像契诃夫小说《樱桃园》里的主人公。我们都在苟延残喘，在挣扎。而与此同时‘园子’正在被砍掉……”

战 争

……一条从车臣来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消息在总参各办公室里传开了。杜达耶夫分子把我们三个被俘人员钉在十字架上。恰巧

指薪金，旧卢布。——译注

是在复活节前。手掌被钉子钉穿了。有两个人当即失去了知觉。第 3 个人身子骨较硬，要求向他开枪。最后，车臣分子“发了善心”。在这同一天，克里姆林宫发表一则消息，称叶利钦向杜达耶夫司令部发了一份电报，邀请他们谈判。就在不久前，克里姆林宫还称杜达耶夫为匪徒。今天却称他为“车臣独立的支持者”。昨天称他为罪恶独裁制度的头目和武装匪帮的首领。今天称他为“车臣分裂主义者的领袖”。

1994 年暴风雨来临前的深秋，格拉乔夫作为最后的访问者之一会见了杜达拉夫，并且开始明白事态将走向战争。尽管如此，印古什总统鲁斯兰·奥舍夫却一个劲儿地多次劝叶利钦说：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还是可以达成协议的！”

那里怎么样呢？“糟糕的和和气气总比善意的争吵好？”

今天听听当时的安全会议成员的话吧，他们全都反对把我们的军队开进车臣……人们把战争说成是“恢复宪法秩序”。在这场战争中用上了斯捷帕申耳朵，洛博夫的眼睛，沙赫赖的胡须，格拉乔夫的拳头和叶林的大脑，而叶利钦是良心。他们要对成千上万的将士的阵亡负责。那是一座中等的区级的大城市。而用上了 6 个战时编制满员师。至于伤残人数，则是死亡数的 3 倍。叶利钦说，这是“一个错误”，并请大家选他连任下一届总统。据说为的是“将毕生的事业进行到底”。其实，有些错误常常不亚于犯罪……

刚才电视播出，我军又有 20 个士兵在车臣南部牺牲了。

总参通信枢纽的大尉季马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的年青人，鄙视暗中偷听别人谈话的“打小报告者”，在修理我的电话时向我的朋友和精神导师退休上校彼得罗维奇——一位在总参谋部工作的时间比季马来到人世间的年头还要多的人——大声问道：

“叶利钦干了这一切居然还有良心去当总统？”

彼得罗维奇假装没有听见。过去，他因为不谨慎地谈论关于

赫鲁晓夫的笑话而几乎有两次未能按时晋升军衔。从那时起，但凡谈到国家主要领导人时，他就立刻忽然装聋作哑了。然而，近来彼得罗维奇却作出了空前的壮举。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大声谈论叶利钦了。不过，旧有的警惕性仍然在起作用。因此，他对追求真理的季马的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我年青的朋友，良心和权力是不能兼有的呀。”

季马一面修理电话，一面在体味彼得罗维奇一针见血的话。

瓦列拉·切班尼科夫上校在计算机前面扭过头来附和说道：

“有这样的权力就有这样的良心……”

*

*

*

已在编写又一场战局——车臣战争的历史。但愿历史学家不要忘记那些事，特别是我们是如何用一个空降团在两小时内去夺取格罗兹尼的。然后，是如何把我们“含笑死去的”孩子们的尸体像冻牛肉一样运往罗斯托夫的。

在莫斯科郊区契卡洛夫空军基地，源源不断地运来装着银发上校们和 19 岁后生们的尸体的锌制棺材。这些笨重可怕的金属盒已经像地雷一样埋遍整个俄罗斯。“200 号货物”已成为测量我们政策的“成效”的单位了。

1995 年 1 月，在格罗兹尼北郊一个地方，一个车臣狙击手射中了我的朋友——沃洛佳·日塔连科上校聪明的头脑。但愿这个噩耗不要传到他的家里，否则，上校的妻子在听到可怕的消息时就会昏厥，孩子们则会用与阵亡父亲相似的眼睛看着你，从中透露出恐惧的眼光。凡是参加过阵亡战友的埋葬的人，都知道人间没有比朋友的棺材更沉重的东西了。但是如果朋友是在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中牺牲的话，这副担子是难以抬起来的。

最高统帅在黑海游泳，打网球，品尝珍贵的南方葡萄酒，而

他的大军就在附近麻木地摧毁车臣农村，他们模模糊糊地知道他们是奉总统之命来这里建立什么“宪法秩序”的。盲目地为牺牲的同志复仇之火常常是他们英勇作战的动力。世界上还没有一支军队在其士兵不明白为何去牺牲的地方获得过胜利。

一位外科军医在车臣 3 个月在人体上做手术的次数比他服役 30 年间做的手术都多，他多次告诉我，他从致残的伤病员那里最常听到的呼声是“这是为了什么？”上校不知道答案。军队不知道答案。国家不知道答案。

“……这个政权必不可免地要使兄弟同根相煎。叶利钦是政权的心脏。在克雷拉茨科耶我们教堂附近一位老妪对我说：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是神命受过登极涂油仪式的君主。”

可是，就在那座教堂附近汽车库的墙上有人写了大字标语：“上帝啊，请惩办叶利钦吧！”……

往 事

……在戈尔巴乔夫作出关于我军从欧洲撤回国的“历史性”决定后，部队士气空前瓦解的时期就开始了。当一支军队“胜利退却”时，当这支军队明白受到本国当局的侮辱时，情况总是这样。当一支军队感到不再需要其力量时，它就会瓦解，它几乎就会把全部精力用于靠自己掌握的一切去谋求生存……

我记得很清楚，一次国防部长给西部军队集群总司令马特维·布尔拉科夫上将发去了一份口气严厉的密电，要求遏制军官层中的道德败坏。这种道德败坏的表现常常特别可耻。祖布科夫大尉的形象在我有关在德国服役的那些年代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个特别的痕迹……他总是夜里爬到人家屋顶上去拆卸电视天线，然后卖给另一处驻德苏军的同事。军队按照其历来的“占领”

统，总是关心在回国时不要两手空空，何况它知道，在国内既没有钱，也没有住房……

当放开手脚大搞“野蛮的”交易时，军队的道德又进一步败坏了。军队有庞大而监管糟糕的武器技术装备、物质财产和其他物资的储备，对军队进行裁减，加上“允许”部队经商，在军队中产生了靠国家财产非法致富的贪婪心理……

世界上最大的军队集群——西部军队集群——在 1991—1994 年变成了军民窃贼的克朗代克^①。出售军队动产和不动产所得巨额外汇资金本应遵照叶利钦的命令用于为军人建筑住房，却往往被存入俄罗斯或外国的银行生息。扛着将军肩章的蠹虫为了私利滥用职权“指挥”财流、物流和商务活动。

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份文件（后来在报刊上披露了），由国防部总军事预算与财务总局局长在上面作了批示，其实质就是怂恿下属“绕过”叶利钦关于处理出售军产所得外汇的规定的命令。所得外汇金额是天文数字。中央银行当时坚持至少有一半“军钱”置于其监管之下。但是，有人设法欺骗中央银行，隐瞒应缴额。这是在从爱国主义出发关心军队利益的幌子下搞的勾当。

一些军官不停地穿梭于莫斯科与温斯多夫之间，为的是给国防部和总参谋部里的首长送去德国的二手汽车。对许多人来说，在德国廉价购买一辆车，然后运回俄罗斯，是极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当一些指挥员日夜在为自己的部队没有住房头疼时，另一些指挥员却为了寻找有利可图的生意伙伴而在德国四处奔走。这样的伙伴往往连找也不需要去找——他们自己就会来到司令部，提出对这些首长十分有利，然而对部队却极其不利的交易。国家和

^① 克朗代克系加拿大西部的黄金产地，1897 年发现。于 20 世纪初引起“淘金狂”。这里指“淘金场所”。——译注

军队因此蒙受重大损失。合同金额越大，亲手签订合同的人的“个人收入”就越多。节约是不利的。

令我吃惊的是国防部一些将军的厚颜无耻：从国外撤回的军官和准尉与家人在空地的帐篷和棚子里栖身，许多住房工程建筑“因资金不足”而冻结，可是，国防部长及某些副部长却购买昂贵的外国名牌汽车，在莫斯科近郊营造豪华的别墅，把几千万美元和德国马克用于经商……对于那些善于“利用时机”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天堂的日子。国家缺乏监督和不讲原则使将军们变得腐败，这也是政权当局对效忠者给予回报的一种形式……

数万军官和准尉四处奔波，指望能以承受得起的租金为家人租得一个角落，而同时却有几十位建筑师在埋头为将军们设计多层的别墅。

总检察院和总军事检察院的侦查员因为企图揭开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有牵连的刑事案件而往往得到“严厉教训”。那些过于坚持的人换成了容易说通的人，于是，那些刑事案件就给“砸”了。报纸登载了证明一些高级将领犯罪的文件，披露了国防部巨款“周转”的俄罗斯和外国银行的字号，护法机关掌握了数千份说明给武装力量造成重大损失的合同文本，而联邦司法部竟然要么避不作答，要么断言“没有犯罪要素”……

在《俄罗斯报》登载了揭露国防部商贸总局营私舞弊大案的第一份材料后，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要求商贸总局局长维克托·察里科夫作出说明。后者向阿尔巴特送来了一整包“辩护书”。我奉命据此起草反驳报纸的文章。鉴于这些文件具有专业性，我不得不求教于国防部军事预算与财务总局的专家。需要就一个主要问题得到回答——莫斯科一家大商业银行的帐户上有从西部军队集群获得的 4000 万马克是否合法。军事预算与财务总局使我茅塞顿开，以致挖空心思也无法写出哪怕是一篇短短的反驳文章。因此，这篇文章始终也没有在报刊上出现。商贸总局一个劲愤怒

地对我说，《俄罗斯报》在撒谎。总军事检察院的侦查员则说是“出于侦查考虑”拒绝作出任何评论。同时，罪犯们一起上阵匆忙销赃灭迹……

察里科夫及其同伙好长时间以后才被逮捕，因为总检察院换了新的领导……我的一位朋友，一个反间谍工作者，揭开了“将军案件”，为此至少应授予勋章。本来，此事应该划上句号。不料，这位少校被“因家庭原因”打发去“休假”——离莫斯科远一点。他是一个过于诚实的军官……

“ 逃跑 ”

……有一次，我有机会与英国军事使团的军官在德国一家著名的啤酒馆里坐坐，当谈到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叶利钦同意我军从德国空前迅速“逃跑”的屈辱性条件时，一个英国军官公然用手指在自己太阳穴上旋转。

过去，英国驻西德军队的人数是苏军驻东德人数的三百分之一。英军撤离德国用了十来年的时间。我们竟匆匆忙忙在 3 年内撤出 50 万军人。其中近 7 万人无栖身之地。我们被迫将大约 20 个师甩在空地上。

那时，我去过博古恰尔驻地，在沃罗涅什郊外。营区建设刚刚开始，军官及家属就住在泥泞不堪的帐篷和临时搭建的窝棚里。该师的军官甚至有国防部和总参的代表在场也不怕责骂当局。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不应该从德国撤军。他们主要强调的是“一切应该有条不紊地进行”，要有计划，讲体面，撤军的速度要与住房和军营建设的速度相适应。道理是最简单不过了。可是，戈尔巴乔夫看来公然对此满不在乎。他靠损害本国官兵的尊严在德国人中间博得了廉价的声誉。叶利钦也是一样。而且，不

仅不阻止我国最强大的师团“逃跑”，相反，还加快其“逃跑”速度，主张“在更短的期间内”撤军。

在博古恰尔那里，寒冷的秋雨绵绵不断，我们坐在帆布帐篷里，用迫击炮弹上的铝制小帽饮用兑上了水的酒精，同时观看业余爱好者用摄像机拍摄的欢送俄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德国的场面。

……明显地“感到疲倦的”叶利钦，缺乏信心地指挥着一支军乐队，不时地对胆战心惊的随行外交官中的不知什么人发雷霆。一位同样“疲倦了”的国防部副部长偷偷地在飞机舷梯下面小便。前西部军队集群总司令布尔拉科夫上将目光忧虑重重。其主管政治工作的副总司令伊万努什金将军，1994年9月1日在其顶头上司于莫斯科郊区契卡洛夫空军基地候机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睡着了……

一个过去精锐的坦克师在1994年那个寒冷的秋季进驻沃罗涅什极其肥沃的黑土地，参谋们用俏皮而粗野的骂娘话对最高统帅的反常行为大声嘲笑。那是不愉快的笑声……

建筑工人十分卖力。用“德国人的钱”建起了漂亮而舒适的军营。参加落成典礼的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和新闻记者。我们的军官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当人们回忆起1994年秋热烈欢送最后一批苏军撤离德国的情形时，一位军官终究忍不住“往一桶蜂蜜里滴了焦油”，说道：

“请向德国人转达俄罗斯军官因我们最高统帅不相称的行为而表示的歉意……”

红 场

……总参对外联络局一个经常去外交部的参谋听说，早在

1994 – 1995 年冬季，在胜利日 50 周年到来之前，叶利钦就在莫斯科如何举行胜利阅兵式与克林顿和科尔不轻松地进行了通信。似乎无论是克林顿还是科尔都各自提出了条件：一个认为列宁墓不方便，另一个不愿意俄军在红场上举行分列式。这是否真实，不得而知，但是，列宁墓上的“列宁”二字被遮盖起来了，阅兵式则改在俯首山举行。

关于阅兵的事，叶利钦也遇到了来自自己同胞的麻烦。参战的老战士们给他写信，请求阅兵式“全部照原样”在 1945 年举行阅兵的地方举行。“庆贺发起者”的请求被满足了一半：有老战士方队参加检阅——可以；有部队进行阅兵式——不行，还请大家光临俯首山。谁不方便，我们提供大巴。

给“有组织的”老战士制做了节日的盛装。老人们就此大开玩笑地说：谢天谢地，这下子不用穿着破衣烂衫睡进棺材了！老战士们穿着新衣服看起来很体面。然而，穿歪的旧鞋使许多人大煞风景。还有光脚穿着凉鞋的……

有人说，老战士曾请叶利钦任命别的将领取代国防部长担任检阅总指挥。他们说，格拉乔夫既没有打过仗，又“不是那号人物”。克里姆林宫认为这个意见是“老人的怪念头”而置之不理

.....

1992 年，胜利日前夕，一则电台广播令我吃惊。广播说朱可夫攻克柏林干得不漂亮，德国飞行员比苏联飞行员本领大，还说我们的将领秘密为德国情报部门效劳挣外快……

特别令我不安的是一个显然是被人收买的记者的武断说法。他说，德国空军飞行员比我们的飞行员击落的飞机要多得多。于是，我就给电台打电话，以正视听：在战争期间德军是按发动机数量计算击落的飞机数，而我们则按整架飞机计算。他们击落我们一架双发动机飞机算做击落两架……

电台谁也不愿意听取任何更正的意见，更不必说反驳的意见